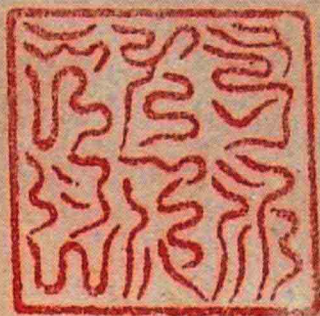


收藏
起步丛书

碑帖

仲威 著

聖教宗拓極舊者每苦墨濃而畫易昏此本
拓舊而畫極分明深可寶也張應台印
肅帖者蓋是極審細之初拓故畫多劑細



大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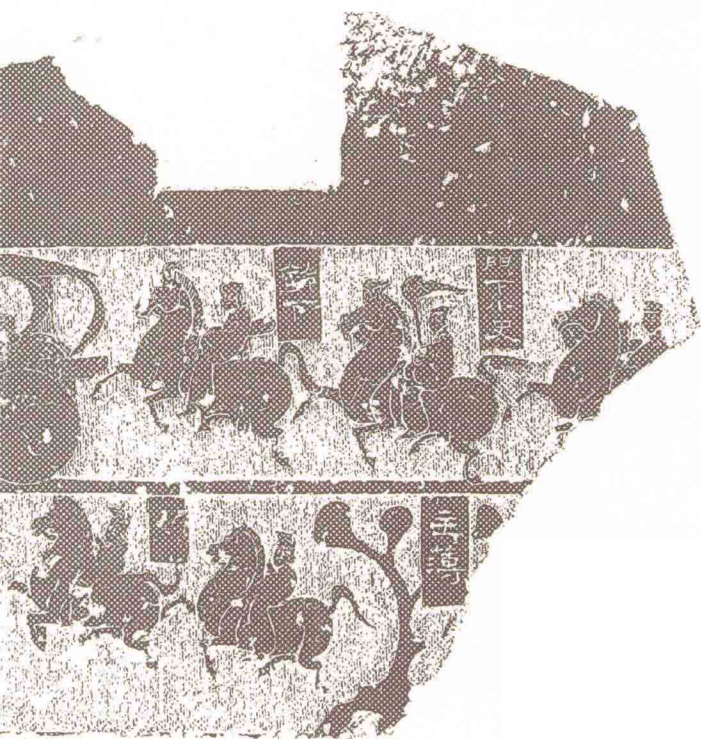
上海文化出版社



收藏起步丛书

碑帖

仲威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碑帖/仲威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
(收藏起步丛书)

ISBN 978 - 7 - 80740 - 302 - 9

I. 碑… II. 仲… III. 汉字 - 碑帖 - 收藏 - 中国

IV. G894 J2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1062 号

责任编辑 唐宗良

装帧设计 颜 明

书 名 碑帖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bcm.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8

印 张 $7\frac{1}{3}$

插 页 1

图 文 132 面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21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302 - 9/G·467

定 价 48.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 - 64855582



目录

碑帖的起源与发展

碑的演进/005

碑的形制/007

碑额与碑身/008

碑穿与碑晕/009

碑座与螭趺/010

帖的拓展/011

碑与帖的区别

碑的种类/016

摩崖/016

碣石/022

碑版/024

墓志与塔铭/027

造像题记/033

文献碑/038

帖的概况

宋代刻帖/045

明代刻帖/048

清代刻帖/055



《淳化阁帖》的刊刻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



《正始石经》高8尺，宽4尺，与《熹平石经》形状相仿。



拓片与拓本

拓片概况/063

拓片分类/065

拓本组成/068

封面与题签/069

题端与题跋/071

题画/072

图例/072

照片/073

书衣、函套与木匣/073



大基山现存摩崖
多为名胜题字，
《郭静和题字》石
现已佚。

碑帖鉴定与收藏

碑帖鉴藏概说/075

碑帖作伪概况/077

碑帖造假手法举要/079

碑帖鉴藏的知识与能力/089

碑帖精品赏析

碑刻掇英/092

法帖撷粹/109

附录

历代翻刻《淳化阁帖》情况图/121

宋代刻帖简表/122

历代个人法帖简要/124

中国三大碑林简介/128

墓志著名收藏地简介/131

卢舍那大佛形象
端庄、慈祥、宁静，
睿智，是理想化
的佛的典型，是
中国雕刻史上的
杰作。



碑帖的起源与发展

碑的演进

“碑”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石刻形式，在游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时，经常会与历代碑刻擦肩而过，其中有些碑刻可能还是儿时习字的入门教材。虽说不陌生，但大家一般都会用“碑”这一名称来泛指历代石刻文字的全部，而不去区分它究竟是刻在山崖上，还是寺庙、学校、陵园、官府等等。对从“碑”上印拓下来的装订成册的文字，径直称作“碑帖”，其实“碑”与“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最初“碑”这一汉字是用来指称单独竖立的木桩。这种木桩顶端还有一个圆孔，这一特殊的圆孔还有一个专业名字叫做“穿”。这种远古的“碑”大多立在墓穴上方四角，是专门用来下葬的，将下棺的绳索（古代书面语叫做“紼”）穿过“碑”的

圆孔，一头拴着棺槨，一头用人力慢慢收放，徐徐将棺材下放到墓穴中，然后填土堆埋。在整个下葬过程中，“碑”起到了辘轳架作用，类似于最原始的“定滑轮”。古文献记载为诸侯执紼者有500人之多，皆牵紼而负引，以击鼓为号，逐节舒纵，我们可以从中想见当时的辘轳架一定高大无比，堪称“丰碑”。

“碑”的这一最初原义，我们可以在唐代陆龟蒙的《野庙碑》中得以充分印证，陆氏云：“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埋葬）用木。”可见，远古的“碑”为木质而非石质，上面并未书刻文字，与我们今天认识的“碑”截然不同。1986年，在陕西凤翔秦公大墓的墓道中出土了四件无字下棺竖木实物，其高1.7-2米、直径0.4米的木桩，这一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原始意义“碑”的实物样本。

埋葬结束，墓穴四周的“碑”（竖木桩）一般不再移走，这种醒目的“碑”有标识墓葬方位的作用逐渐被人们发现和利用，所以“碑”从产生之初就与墓葬风俗紧密联系。由于木质的碑容易腐烂，“碑”又由下棺的木质辘轳架逐渐改良成石质的“碑”，后人称之为“墓表”。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墓表”仍是无文字的竖石。后来偶尔有人开始在无字的竖石上书刻死者姓名、籍贯等少量文字，其墓葬标识用途被逐渐发挥出来，随后在“墓



古墓梓木

1986年在陕西凤翔秦公大墓出土的梓木，我们可以借此想见“竖木”这一最初被称为“碑”的大致样式。



表”上刊刻文字流行起来。直到汉代，臣子为追述君父的功绩与美德，才在“墓表”上书刻大量表彰业绩的铭文，从而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墓碑”，并由“墓碑”逐渐繁衍派生出“记事碑”、“功德碑”、“刻经碑”、“祭祀碑”等碑刻家族群体。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先秦时期还有两种器物亦被叫做“碑”。其一就是古代宫廷“测日影”的计时工具，后人称为“日晷”；其二是祠庙、衙门、学校等公共场所门口用来拴牲口的柱子。将测日影的日晷和拴牲口的柱子命名为“碑”，就是缘于同是无字竖石或竖木。1996年在新郑市黄帝故里西侧600米处的韩国宗庙遗址，发现一块“无字碑”。整体呈圭形，上半部像匕首，下半部中间还有一穿孔，质地是灰色沙岩，正反两面上部都被人工打磨。它全长3.25米，宽0.45米，厚0.25米。此块“无字碑”应是战国时期韩国太庙所立之“碑”，这比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汉代石碑还要早数百年，被誉为“中华第一碑”。



古代被称为“碑”的拴马柱

西安碑林陈列的各色明清拴马柱，虽非远古的拴马柱，但它的功用与远古的“碑”完全相同，只是雕工与样式花哨了些。

地是灰色沙岩，正反两面上部都被人工打磨。它全长3.25米，宽0.45米，厚0.25米。此块“无字碑”应是战国时期韩国太庙所立之“碑”，这比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汉代石碑还要早数百年，被誉为“中华第一碑”。

既然最初的碑都是没有文字的，那么古人纪事书写于何处？从现今考古发现，古人早期纪事大多附载于各种生活器物上，又因期望流传千古，故多选材坚硬。我们在参观博物馆时不难发现，人类早期文明都留在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之上，石刻文

左上图：古代被称为“碑”的日晷

河南新郑市黄帝故里陈列的日晷，虽属现代仿制品，将金属棒代替了最古的“碑”，就姑且当作“推陈出新”来看。

左下图：中华第一碑

1996年在新郑市韩国宗庙遗址上发现的“匕首碑”，它的具体功用至今还是一个谜。但无字，有穿孔的特性极似远古的“碑”，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碑”。



字出现得很晚。早期的石刻文字并没有为了铭刻而对岩石进行外形加工，只是简单地利用石块或石壁的天然形状，此时的“碑”当然也就没有相对固定的外部形制。因此，古人对先秦石刻文字不称为“碑”，而称“刻石”或“立石”，这一称呼一直保持到西汉。现存西汉著名刻石有：《群臣上寿刻石》、《鲁孝王刻石》、《莱子侯刻石》、《甘泉山刻石》、《居摄两坟坛刻石》、《襁盗刻石》等等，没有一块是称为“碑”的，一律叫做“刻石”。



西汉刻石拓片

《莱子侯刻石》，有界栏，类似汉简，从中可见早期碑刻的雏形。因其还没有“碑”的固定形制，故此只能被称为“刻石”，还不能叫做“碑”。

记事载体从数量有限、价格昂贵的青铜器转移到取材方便、价格低廉的石头，“以石代金”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种必然选择。加之刻石材巨形丰，性坚质稳，故秦朝以后，刻石蔚然成风，镂金渐次绝迹，刻石又依照铭刻的目的与用途的不同，逐渐分化产生出各种不同外形的石刻类型，其中就出现了具有现代碑帖含义的“碑”，这一石刻形制在东汉得到了普遍接受并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后人广泛遵循的碑刻制度。从无文字、无固定形制的原始“竖石”，发展到东汉有一定形制、一定文体的铭刻碑版，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演化过渡时期，并延续至今未有大的改变。

现今我们所说的“碑”，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碑”是指众多石刻文字中的一种，其铭刻载体必须是经过精心加工磨制的、有一定形制规格的长方形竖石。而广义的“碑”，则是泛指各种类别、形制的石刻文字，如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塔铭、石阙铭、造像题记、画像题字、刻经文、界石铭、建筑构件题字等等，“碑”成为一种石刻集合名称。

碑的形制

东汉是“碑”这种石刻正式定型的重要时期。碑一经定型，便在宫廷、庙宇、通衢、陵墓、园林广泛应用，并成为最主要的石刻类型。碑的外形大致可分为碑首、碑身、碑座（或称碑趺）三部分。汉碑的碑首与碑身大多连为一体，其底部插入碑座顶上的榫槽内，另有少数没有碑座者则直接插入土中。汉碑的碑首形状分为圭首（三角形尖顶）、圆首、平首（或称“齐首”、“方首”）三种样式。圭首碑就是上锐下方的尖头碑，因形状与“玉圭”相似而得名。“玉圭”在古代视为通灵的礼器，被列为五瑞之一，是一种崇高的信物。周代筑坛祭祖时，就有将玉圭埋入坛下奉献给祖先的祭祀方法，早期墓碑、祭祀碑的碑首采用“圭”形，就是源于它具有的“通灵性”。汉碑中圭首碑有：《郑固碑》、《鲁峻碑》、《鲜于璜碑》、《景君碑》、《白石神君碑》、《仓颉庙碑》等等。“圆首碑”即指碑首为半圆形，通碑外形“上圆下方”隐含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平首碑”就是长方形石板，造型最为简朴，但在汉碑中数量不多。



碑首样式——圭首碑

《仓颉庙碑》是典型的“圭首碑”，以其碑首呈三角形，类似“玉圭”而得名。将碑首制成“圭形”，期望碑刻也同“玉圭”一样能够通灵，将碑文记载的信息告知天地神灵。

碑额与碑身

碑首正中央部位称为“碑额”，其位置类似于人的额头，故名。上多用篆书题写碑名，故又称为“篆额”或称“额题”。额题文字书体除篆书外，尚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极少见。

碑身正面称为“碑阳”，背面称为“碑阴”，两侧称“碑侧”，一般将靠近碑阳碑文首行的一侧称为“左侧”。碑阳刻写碑的正文，碑文逐字自上而下，逐行自右而左书写，亦有少数碑文逐行自左而右书写，我们称之为“左行”。碑文一般先用散文记事，后接韵文（三言、四言、五言、

七言）赞颂。碑阴多刻门生故吏、撰书人、立石人姓名以及捐资建碑数额等。碑文如果过长，一般依顺时针沿碑阳、碑侧（右）、碑阴、碑侧（左）环刻碑文。少数碑阴另刻其他内容者，称为“后碑”。此外，汉碑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特征，即额题位置一般因势而就，不必强求居中。碑文亦有偏于碑身右侧，不求满布的情况，这些特点在后世碑刻中均十分少见。

东汉以前书碑人多为书佐小吏，鸿儒大家极少涉足，所以汉碑多不见书碑人姓名，存世汉碑中留有书碑人名姓者，仅有五例：《武斑碑》之纪伯允、《华山碑》之郭香察、《衡方碑》之朱登、《西峡颂》之仇靖、《郾阁颂》之仇绋。隋代以前书碑、刻碑一直被视为匠人之事，不受重视。唐朝以后，由于碑文化的繁荣，帝王将相、士族名流纷纷加入碑撰、书刻活动，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书写了《晋祠铭》、《温泉铭》，武则天书写了《升仙太子碑》，李隆基书写

了《石台孝经》、《纪泰山铭》，七十六岁高龄的太子率更令欧阳询还奉敕书写《九成宫醴泉铭》等等，书写碑文在观念上从一件苦差事转变为一项高雅而流芳百世的文化大事，

这样就开始形成在碑版上加刻撰者、书者、刻工名姓的风气，为书法史留下了大量书家资料。

汉碑碑面文字排列样式

《韩仁铭》东汉著名碑刻，其碑文偏向右侧，左侧刻有金至大五年（1228年）十一月赵秉文、李献能题跋。可见汉代刻碑当时文字并不求满布，当止则止，不同于后代刻碑，预先估算好字数行数，打好界格，填满碑面。



碑穿与碑晕

汉碑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碑额下往往多凿有一个圆孔，直径在 10 厘米以上，称为“穿”。圆首碑“穿”四周一般还刻有三圈的弧形纹，称为“晕”，如《赵葭碑》、《营陵置社碑》、《孔宙碑》、《仙人唐公房碑》等。



碑首样式——有“穿”有“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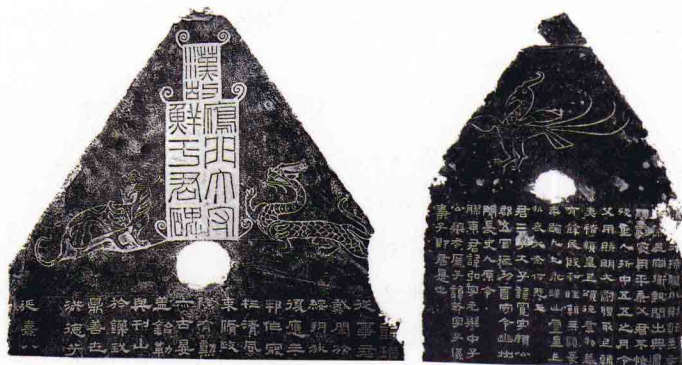
《赵葭碑》东汉最典型的、最标准的碑例样式，有“穿”有“晕”。“碑穿”可能象征着天上的日月，“晕纹”则代表日月之光环。后来“晕纹”再逐渐演变为“蛟龙纹”。

大家不禁要问汉碑为何要有“穿”、有“晕”呢？这共有三种不同推测，第一种认为这是汉碑沿袭早期竖石葬俗，“碑穿”就是模仿下棺轳轳架上的圆孔，“碑晕”是模仿下棺引绳在“定滑轮”上摩擦痕，属于一种复古做法。第二种认为汉人深受“天人相应、天人一体”思想的影响，碑之圆首就象征着天，而“碑穿”则意味着天上的日月，“晕纹”则象征为日月之光环。最后一种说法就是，

墓碑的“穿”与“神主”相通，“神主”就是古代放在宗庙中逝者牌位，类似后世民间的灵位牌，“神主”一般木制，高一尺二寸，中间亦有孔。究竟哪种推测最正确，还是三种说法都有合理性，至今尚无定论。

汉碑穿孔的位置高低、形状大小并不整齐划一，但一般多在碑额的额题之下，碑身的碑文之上，起到分界碑额与碑身的作用。亦有少数汉碑的“穿”在碑身正中，如《袁安碑》、《袁敞碑》等。魏晋以后，沿袭数百年的“穿”、“晕”古制逐渐废止，从此额题必求居中，碑文必求满布。

随后在三圈弧形“晕纹”的基础上发展变形为蟠、螭（一种无角的黄色龙）等图案，晕纹本身转变成龙身，晕纹的两端雕刻出下垂的龙头，如建安十年（205 年）《樊敏碑》。汉碑碑额的纹饰得到较大的扩展，出现了“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仙人、祥瑞、神兽、珍禽等。如汉代的《鲜于璜碑》，碑额正面刻有青龙、白虎，背面刻有朱雀，碑座代替玄武，这样“四灵”齐全。南北朝时期碑额四灵中的青龙图案相继为蟠龙纹、蛟龙纹所替代，龙纹的出现，



碑首样式——四灵

《鲜于璜碑》碑阳碑额两侧刻左青龙、右白虎。

《鲜于璜碑》碑阴碑额刻朱雀，碑座代替玄武，如此四灵齐聚一碑。碑额阳文铁线篆书亦极具特色。此碑 1973 年天津武清县出土，今藏天津艺术博物馆，传拓较少。



已经超越了祥瑞神异的含义，更成为皇权与地位的象征。

隋代以前的螭首碑，一般雕刻二条或四条螭龙，龙形瘦小简洁。到了唐代，正规重要碑刻的碑首均有六条浮雕蟠螭，龙躯浑圆粗壮，腿爪强健有力，两爪在碑额正上方托起一枚宝珠，宝珠四周刻有火焰纹，或者宝珠下刻束腰莲座。此枚宝珠在佛教中称为“摩尼如意宝珠”，是佛教的法物，佛经上说它是由佛陀的碎身舍利变化而来，能为人间施福，法力无边。因如意宝珠深藏大海，一直由龙王看护，故它也跟着龙王一起被刻入碑首。



碑额样式——摩尼如意宝珠

《道德阿弥陀像碑》碑额中央冒着火焰被蛟龙托起的正是“摩尼如意宝珠”。相传它是由佛陀的碎身舍利变化而来，能为人间施福，法力无边。

碑座与螭趺

汉代碑座多为方趺，不加雕饰，有的甚至没有碑座，直接插在土里。我们今天熟悉的乌龟形碑座出现的较晚，直到汉光和六年（183年）才出现在《白石神君碑》和《王舍人碑》的碑座造型上，后人称之

为“龟趺”。

龟趺可能由玄武演变而来，俗传此龟形物为“龙生九子”之一，形似龟，好负重，名曰“赑屃”，亦名“霸下”。唐代以后，这种昂首凸目的龟趺成为最普遍的碑座形式，人们认为它力气大，寿命长，希望它能永远驮着碑石，流芳千古。此外，龟趺



碑座样式——龟趺

西安碑林陈列的龟趺碑，此龟学名“赑屃”，为“龙生九子”之一，又称“霸下”。它力气大，寿命长，能胜任驮碑“流芳千古”的使命。客观上龟趺增加了碑的底面积，能防止碑身下沉和倒伏。

的底面积较大，能起到防止碑刻沉降的作用。唐碑碑座除“龟趺”外，还有“须弥座”和“方座”，这两种碑趺式样一般被与佛教有关的碑刻所采用。如柳公权书《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就是采用“须弥座”，史惟则隶书《大智禅师碑》则采用“方座”。唐碑在外形上较之汉魏六朝的碑要巨大得多，动辄四五米之高，因此唐碑的碑额与碑身只能分离为二，各自单独加工雕刻，然后拼装组合竖立。碑额较碑身略厚，还能起



碑座样式——方座

《大智禅师碑》碑座雕刻精美，力士栩栩如生，他们给人的力量感不亚于“鼎足”。

到防雨作用，减缓碑身刊刻文字风化剥蚀速度。此外，唐碑碑首范式中还演化出一种同时具有汉碑的圆首、圭首两种寓意的样式，圆首即指蟠螭浮雕在碑首外围，暗含天圆地方之意。圭首即缩化为尖头状的中央题额部分，带有通灵意愿，在一块碑上巧妙地将两种碑首寓意复合在一起。



碑首样式——内含圭首

圆首碑的碑额内含圭首，是唐代以后碑首流行样式。将圆首碑与圭首碑的寓意合而为一。

至此，正式确立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的经典碑式，并为历代遵循。碑已经成为集书法、文学、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的精美石刻艺术品。碑除了普遍用作标识冢墓、铭功颂德、纪事立言外，还被用来刻写经文、药方、书目、谱牒、

地图、天文图等多种用途。碑的文物、史料、艺术价值逐渐得到后人重视，唐、宋之际还出现了西安碑林等专门收藏保护历代碑刻的机构，继而出现了针对金石碑版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



《石台孝经》

唐玄宗李隆基撰序、注并隶书，四面碑刻合成台形，碑首雕刻富丽而庄严，呈现出盛唐气象，它是西安碑林第一号的藏品。碑林最初就是保护《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而开设的，后来逐渐扩展到收集其他碑刻，久之才形成现在的规模。

帖的拓展

“帖”在《说文解字》上解释为文书卷子的标签，因为书写在帛上，所以“帖”字从“巾”部。后来“帖”又由“题签帛书文字”这一概念扩展为“小件篇幅的书迹”，用来泛指书写在纸、帛、素等载体上的文字。魏晋以后直至唐代，“帖”才被用来称呼“法书”（就是“名家墨迹”）。“法书”被称为“帖”可能就是缘于“帖”有小件



篇幅书迹的含义。

古代无法影印“法书”，要想复制“法书真迹”只有钩摹（唐代称为“响搨”），但钩摹一次只能得到一件副本，费时费力，想要批量生产只能借助刻碑、拓碑复制方法，将“法书”刻到石版或木板，称为“刻帖”或称“法帖”。

初唐时期，墨拓碑刻之风渐盛，为揭开刊刻“法书”的序幕作了物质上的准备。唐咸亨三年（672年）怀仁集王羲之书刊刻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由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刻。此碑刻成后，文武三品以上获准捶拓，王羲之的法书得以较大范围流

传。此举直接启发了“法帖”的刊刻，促成了弘文馆模勒刊刻王羲之《十七帖》。此外，当时民间还有用木板翻刻李斯《峯山刻石》帖的事例，杜甫诗云：“峯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此类刊刻一人少量书迹的简短刻帖被称为“单刻帖”，而汇刻单人、数人或历代名人的多卷帙法书称为“丛帖”，或称“汇帖”、“套帖”。简言之，“丛帖”就是若干“单帖”的组合。但至今尚未发现有关唐代丛帖的文献记载与实物资料。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唐代以前古人所称的“帖”，一般就是指“法书”，是黑字白纸的真迹或真迹摹本；唐宋以后所称的“帖”，多为白字黑纸的刻帖拓片，是一种特殊的手工印刷品而非真迹。由此可见，唐、宋人对“帖”的称呼差异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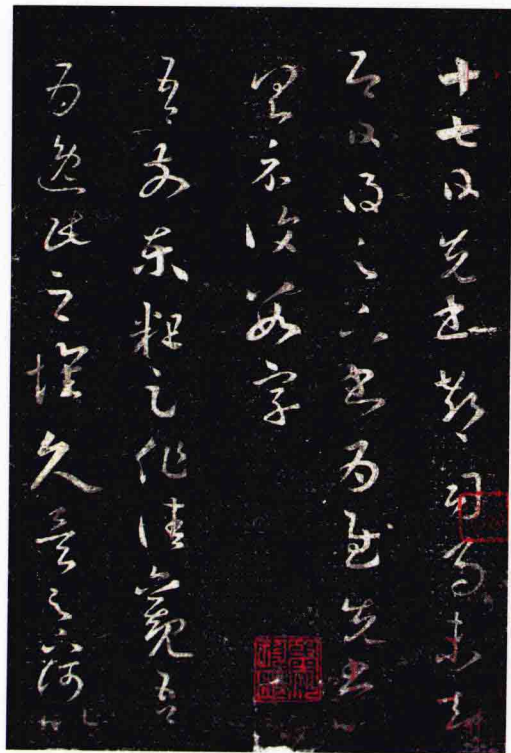
传说丛帖的刊刻始于南唐。据清吴仕臣《十国春秋》载，南唐李后主继承了大唐内府的书画名迹后，在保大七年（949年）曾命仓曹参军王

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世称“保大帖”。除《保大帖》外，相传李后主还曾诏令徐铉辑刻了《昇元帖》。宋米芾《书史》中也提到有《江南



南唐李后主像

相传李后主曾诏令刊刻了最早的《保大帖》、《昇元帖》，惜无实物流传，南唐有无刊刻丛帖的问题至今仍是解不解之谜。



《十七帖》姜宸英藏本

《十七帖》是现存最早一部王羲之的刻帖。因起首“十七”二字而得名，共有29帖，133行，1160字。此帖书法体势流畅，气象超迈，不仅在王羲之的草书帖中最著名，而且还是历代草书之绝品，被奉为“今草极则”。

十八家帖》，明代董其昌还提到南唐刻《澄清堂帖》的说法，但是以上诸帖因仅见于文献记载，尚未见有真本流传。（按：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宋拓《澄清堂帖》是南宋坊间取官私杂帖内王羲之书迹，汇次上石，排辑卷数，貌似古帖，实非南唐刻帖。明清之际，还出现大量帖尾刻有“昇元二年三月或五月，建业文房模勒上石”字样伪造的“澄清堂帖”。）所以关于南唐有无刊刻丛帖的问题至今还是个不解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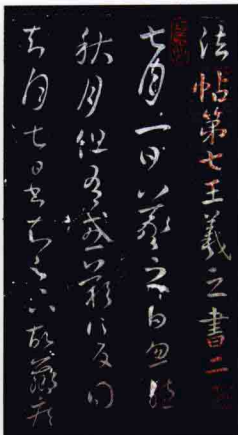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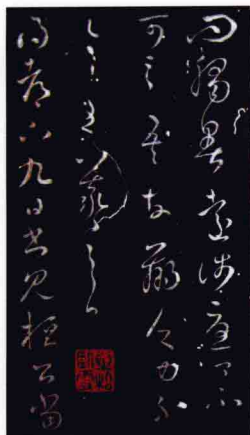
现存最早的一部官刻丛帖是北宋刻《淳化阁帖》，被称为“帖祖”。宋初，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著甄选内府所藏历代帝王、名臣、书家等墨迹作品，于淳化三年（992年）摹勒上石。“淳化”是摹勒刊刻的时间，兼之书法作品都出于皇宫内阁，故《淳化阁帖》又称《淳化秘阁法帖》，或简称为“阁帖”、“官法帖”、“法帖”。“法帖”说明它是供学书之法则。

宋代“帖”的概念已经开始由“法书墨迹”转变为“刻帖拓片”，同时后世“帖学”研究关注的核心也定格到“刻帖拓片”上。虽然到了清代中后期，“帖”的含义进一步扩大，被用来泛指从石刻上传拓下来并装裱成册的拓本文字。如



宋太宗像

淳化三年宋太宗命令王著摹刻了我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丛帖——《淳化阁帖》。在皇权的直接干预下，导致这一宋代文化配套工程最终却无意间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淳化阁帖》卷七王羲之书

《淳化阁帖》收历代书法作者102人，计420帖，记录了秦汉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发展历程，是名副其实的第一部中国书法史的大型图典。

大家习惯称某人临摹《九成宫帖》、某人临习《多宝塔帖》等等。其实《九成宫》、《多宝塔》皆为唐代名碑并非刻帖，虽然这一“帖”的称呼很不科学，但却被世俗广泛采用。清末随着摄影术传入，影印碑帖拓本得以普及，“帖”的含义又一次扩大，

凡是有关法书墨迹、碑帖拓片的照片及影印件统统都被称为“帖”。

民国至今，大众临帖、读帖的范本，绝大多数已经不是法书、拓本的原件，代之为各类被称为“帖”的印刷品。此外，随着清末“碑学”盛行，加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卑帖”学说的推波助澜，有人甚至将唐碑亦纳入“帖学”范畴，而将汉魏六朝石刻视为“碑学”核心。

“帖”在各个历史时期，虽然名称、定义不尽相同，但是传统帖学研究的对象却还是始终不变地围绕着“刻帖拓片”而展开。



碑与帖的区别

“碑”与“帖”究竟有何区别？有人称碑为竖石，帖为横石，碑多石刻，帖多木刻等等，就连一些碑帖玩家亦无法说清。其实碑与帖的主要区分在于：

1. 功用不同。碑多实用为主，以记事（纪事、祭祀、颂德等）为主要目的，希望通过碑刻将所述事迹流传后世。帖以艺用为主，主要提供临摹书法的范本，目的是通过刻帖将书迹传播后世。



《肚痛帖》原石

《肚痛帖》一直被视为较可信的张旭书迹传本，宋元明清流传极广。在《古诗四首》未影印出版前，人们对草圣张旭书法的认知主要通过此帖。帖石现藏西安碑林。

2. 内容不同。帖多简札、诗文手稿，内容庞杂，形式多样。碑则有相对固定文体形式，如铭、志、牒、传、记等。

3. 书体不同。刻帖主要为了迎合公众提高实用书写水平的心理，因为行草、小楷又为日常所必需，所以历代刻帖书体多为行草、小楷。碑刻文字则多选择庄重的篆、隶、

楷为主，行草较少见。

4. 形制不同。碑多高大竖石，有碑额、碑趺（或称碑座），多正、反两面书刻，甚至四面环刻。帖多横石（约一尺高，二三尺宽），镶于庭院、厅堂墙壁间，用于展示的私家刻帖，多单面刻。坊间用于出售的丛帖，为节约成本，多采用双面刻。套帖、丛帖因所刻内容众多，帖石一块接一块，一般在每块帖石的起首处多刻有卷号、版号，以防发生编次错乱。

5. 上石方法不同。碑多书丹上石，即书家用朱笔直接书写于碑石上。帖则需模勒上石，先将油素纸覆名家墨迹上，用墨笔钩摹出文字轮廓，又在这张油素纸背面再用朱墨钩摹一遍，两次钩摹（每一次称为“单钩”）文字轮廓的工序称为“双钩”，

浙江图书馆碑帖陈列墙

法帖镶嵌在墙上是最常见的保护陈列方式。浙江图书馆碑帖陈列墙中以宋刻《淳化阁帖》最为有名，至今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这套帖石的宋代拓本。



最后再将双钩后的油素纸覆在涂过浓墨并烫蜡的青石上，用木槌隔毡敲打，目的是将油素纸背面的朱墨轮廓线压粘至帖石上。如此复杂的上石过程，只为刻帖的文字书法尽量忠实于原作。

6. 刻法不同。帖多忠实于原迹，以书迹传真为主要目的。碑在这方面顾及较少，尤其是六朝石刻与原迹出入较大，如出土的高昌砖志，一半已刻好，一半尚是朱笔未刻，二者迥异。帖多按书写笔迹先后刊刻，力求还原书迹本来面目。刻碑一般多采用流水作业，先统一刻竖画，将全碑竖画刻完，然后统一刻横画，依次进行。

7. 捶拓不同。刻帖的拓法必须捶拓数次，令纸与石紧密相合，宣纸要求薄细，用精墨几番拓刷，或蝉翼拓，或乌金拓，务必使拓色均一，墨彩生动，文字委婉，波折纤微不渗。拓碑一般多用高丽纸或皮纸，以其纤维长，韧性强，用墨要求不严，甚至采用煤和胶、烟灰和胶、墨蜡等。拓碑多在野外，受气候条件限制较大，一般多选春秋无风无雨季节进行；拓帖多在室内，四季皆可。此外，拓巨碑、摩崖还要搭架悬绳，自上而下分数纸接连槌拓。若拓碑额浅浮雕图案还要有意拓破宣纸，令图案更具立体效果。



拓碑照片

拓碑手法有南派与北派，南派双手持两个扑包，北派则一手持扑包，一手持木板（类似三毛球板），此为南派拓法。



碑的种类

摩崖

先秦时期还未出现有固定形制的“碑”，后世将先秦的石刻统称为“刻石”。又将“刻石”划分为两大类——“碣”与“摩崖”。单独耸立的石刻铭文就叫做“碣”，与天然山崖连为一体的铭刻称为“摩崖”。“摩崖”与“碣”是碑大家族的两大重要分支，它们出现在无字、无一定形制的“原始碑”向完整意义的“碑”进化的一个中间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早期摩崖

在山崖较为平整的石壁上凿刻文字，称为“摩崖”，这也是最古老的铭刻方法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已经开始利用崖岩来绘制人物鸟兽图形或符号，当文字产生后，石刻文字又首先出现在崖岩上。摩崖与山体混为一体，巍然巨制，非其他刻石所能企及，它的制作方法与史前岩画十分接近。“摩”即摩擦、抚摩的意思，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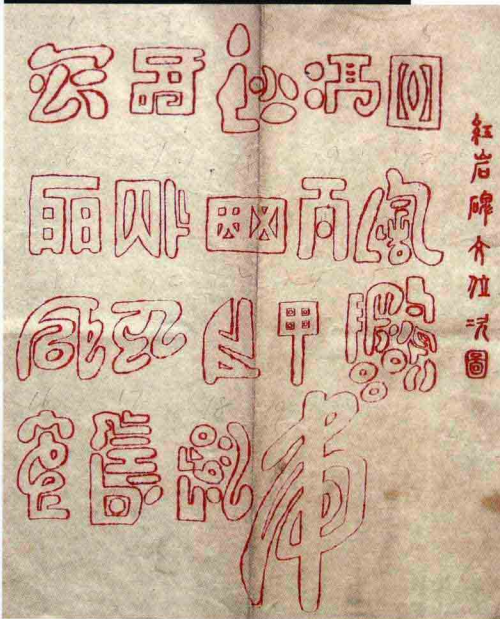


贺兰山太阳神岩画

摩崖题刻起源于原始岩画，早期岩画多带有图腾崇拜象征意义。然后再由图画转为抽象符号，最后发展成摩崖文字题刻。

见“摩崖”也不一定完全利用自然平整的石壁，还要在石面上略加修整、凿平。

早期原始摩崖，一般带有岩画特征，极具神秘色彩，似画又似字，属“图形文字”，当然绝大多数是难以释读的少数民族文字，故被后人称为“仙篆”。这些文字很可能是在汉族进入以前，当地少数民族先人的书刻遗迹。现今考古发现的早期神秘摩崖题刻尚有：《贵州红岩摩崖》、《福建仙字潭摩崖》、《浙江仙居蝌蚪文摩崖》、《江西广昌



《贵州红岩摩崖拓片》选字

红岩摩崖地处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断桥乡龙枣树村晒甲山上，距黄果树瀑布7.5公里。红岩崖是一堵长百米，高三十多米的赤褐色天然石壁。崖上有几十个奇异古怪的文字符号，大者一米见方，小者十几厘米，参差不齐，非镌非刻，非篆非隶，似字又似画，神秘玄奥，被称为“黔中第一奇迹”。

右下图：红岩摩崖双钩位次图